

《太极图说解》的理学思想述略

——兼论朱熹与周敦颐的思想渊源

周欣

(湖南科技学院 濂溪研究所, 湖南 永州 425199)

摘要: 朱熹推尊周敦颐《太极图说》, 以理学立场对《太极图说》进行了诠释与发挥, 并作有《太极图说解》一书。朱熹《太极图说解》明确把《太极图说》纳入理学思想体系, 宗奉二程, 以“理”、“气”释太极, 辟佛、道归儒, 勾勒出天道性命贯通为一的学说, 由此推阐出理学体系的基本框架。

关键词: 朱熹; 《太极图说解》; 理学思想; 思想渊源; 周敦颐; 《太极图说》

中图分类号: B244.7

文献标志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9-2013(2013)05-0076-06

Explan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*Annotation of Zhu Xi's 'Taiji Map'*

ZHOU Xin

(Lianxi Institute,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, Yongzhou 425199, China)

Abstract: Zhu Xi admired Zhou Dunyi's *Said Taiji Map*. He interpreted and expanded it on the standpoint of Neo-Confucianism and esteemed Cheng brothers. He explained Taiji based on Neo-Confucianism and qi, and brought it into the ideological system of Neo-Confucianism definitely. He added Buddhism and Taoism to Confucianism, and fused ideas of the Song and Ming Neo-Confucianism. Then he developed and explained the basic framework of Neo-Confucianism system.

Key Words: Zhu Xi; *Said Taiji Map*; Confucian school of idealist philosophy; ideological origin; Zhou Dunyi; *Annotation of Zhu Xi's 'Taiji Map'*

《四库总目提要·宋四子抄释》云：“宋五子中，惟周子著书最少，而诸儒辩论，则惟周子之书最多。”周子即周敦颐，字茂叔，于宋真宗天禧元年生于道州(今湖南道县)的营乐里濂溪保，因筑书堂于庐山莲花峰下，取营道旧居濂溪以名之，故后人称濂溪先生，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，位居“北宋五子”之首。“诸儒辩论，则惟周子之书最多”源自周敦颐《太极图说》这部学术史上争议最大的

著作，他以“无极-太极-阴阳五行-万物化生”的思维路径，从宇宙论的角度论述人生社会道德心性，开天道性命相贯通之先河，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调。周敦颐在北宋时期声名并不显赫，他及其《太极图说》的声名鹊起，实乃源于南宋大儒朱熹的表彰阐述。朱熹以其毕生精力潜心周子之学，钩玄探隐，“宋明诸儒说《太极图说》，实由朱子发其端，亦以朱子之说影响最盛。”^{[1][22]}据《周子通书后记》记载：“熹自早岁即幸得其遗编而伏读之，初盖茫然不知其所谓，而甚或不能以句。壮岁获游延平先生之门，然后始得闻其说之一二。”(《周子通书后记》，《朱子全书·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八十一)从“茫然不知其所谓”可知，朱熹问学李侗时就已经对周敦颐著作有大致地了解。自乾道三年，朱熹、张栻于长沙会晤，从未发已发的基础上讨论太极，

收稿日期: 2013-09-18

基金项目: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(12YJC720061);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(2010YBB147);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(12YBB105); 湖南科技学院古代文学重点学科资助

作者简介: 周欣(1985—), 女, 湖南永州人, 编辑, 讲师, 硕士, 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。

至乾道六年朱熹作《太极图说解》，经过张栻、吕祖谦等诸人书信往返，商讨论辩，于乾道九年基本定稿，并作有《后记》。朱熹在注解《太极图说》的过程中，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，据朱张吕之间的回信：“《太极图说》，近方得本，玩味浅陋，不足窥见精蕴”（《与朱侍讲元晦书二》，《吕祖谦全集·东莱吕太史别集》卷七），“《太极图说》析理精绎，开发多矣，垂诲甚荷”（《答朱元晦》，《南轩先生文集·张栻集》卷二十二）。可见，从稿本到定本，朱熹从未间断过对《太极图说》的讨论与修订。正如钱穆先生在《朱子新学案》所说：“其有关太极图通书之编纂考核注释，远始乾道戊子，朱子年未四十，此后随时用力，至于淳熙丁未，垂二十年，可谓毕生潜心矣。其有关祀记诸文，发明濂溪之学，上接洙泗千岁之统，下启河洛百世之传，微言大义之所在，在朱子文集中，皆可谓是用力撰写之大文章……后世卒群奉濂溪为有宋一代理学不祧之始祖者，则皆朱子表彰阐述之功也。”^{[2]788}

朱熹将《太极图说》分成十章，逐章注解，以“无极”、“太极”、“动静”、“主静”等为基本范畴，在宗奉二程学说的基础上，又排佛、道归儒，建立起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。笔者拟以朱熹的《太极图说解》为据，在分析周敦颐及其《太极图说》与朱熹理学思想渊源的基础上，对朱熹的理学思想体系进行归纳和阐述。

一、宗奉二程

朱熹在《周子太极通书后序》中明确指出了《太极图说》的重要地位及其与二程学说的关系：“盖先生之学，其妙具于太极一图，通书之言，皆发此图之蕴，而程先生兄弟语及性命之际，亦未尝不因其说。观通书之诚、动静、理、性命等章，及程氏之书李仲通铭、程绍公志、颜子好学论等篇，则可见矣。”朱熹不仅认同二程受学于周敦颐的事实，并且说二程在“语及性命之际”时，常常沿用周敦颐的说法，即“未尝不因其说”。

朱熹在注解《太极图说》的过程中，继承、引

述二程学说，又进一步引申、发挥了二程思想。对《太极图说》首句，朱熹注道：“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，而实造化之枢纽、品汇之根柢也。”这即是引用二程“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”来进行解说。二程认为“理”是天地万物的本源，朱熹在此基础上提出“太极即理”：“无极而太极，只是说无形而有理”，“太极者，如屋之有极，天之有极，到这里更没去处，理之极至者也。”（《朱子全书·朱子语类》卷九十四）“无极而太极”即是“无形而有理”，此理是宇宙万物化生的根源和道德本体的基础，也是《太极图说》的总纲领。在这里，朱熹将“太极”等同于“理”，是宇宙世界的最高主宰，实现了对“太极”范畴的理学化改造。

“太极之有动静，是天命之流行也，所谓‘一阴一阳之谓道’。诚者，圣人之本，物之终始，而命之道也。其动也，诚之通也，继之者善，万物之所资以始也。其静也，诚之复也，成之者性，万物各正其性命也……盖太极者，本然之妙也；动静者，所乘之机也。太极，形而上之道也；阴阳，形而下之器也。是以自其著者而观之，则动静不同时、阴阳不同位，而太极无不在焉。自其微者而观之，则冲漠无朕，而动静之理已具于其中矣。虽然，推之于前，而不见其始之合；引之于后，而不见其终之离也。故程子曰：‘动静无端，阴阳无始。’非知道者，孰能识之！”（《朱子全书·太极图说解》）

周敦颐的《太极图说》虽然提出了宇宙万物生成的历程性图式，但未对存在界作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。为了突出理与气的主题，朱熹对其进行了分解式的区分：太极的动静是本然存在的，为形而上者，不可离开形而下的气。换句话说，太极虽然是冲漠无朕，神秘深奥，但却隐藏着动静阴阳之理。太极的动静生生，不是太极自身的动静，而是太极所乘气的动静。理随气动而动，气的动静则是理的外在表现，太极与阴阳的关系是“理”与“气”的关系，所谓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是气在理的支配下运动的过程。这一解说，既是对太极阴阳动静的诠释，也是对二程理气关系的运用和发展，“朱熹高

度肯定周敦颐对‘太极’的标示，正因为周敦颐标示‘太极’的着眼处在于阴阳二气的统合，而统合便必然有其构型，‘理’正成为这个构型的内在依据。”^{[2][131]} 这表明《太极图说》的诠释即以二程之学为归依。

接下来，朱熹直接引用二程之言作为其解说依据的必要性。动静因太极流行而有时序的不同，阴阳因太极动静而有分立，太极始终存在于不同时的动静和不同位的阴阳之中，也就是说，理与气在时间上没有开始和终结，太极于阴阳永远是结合无间，这就是“推之于前而不见其始之合，引之于后而不见其中之离，故程子曰：‘动静无端，阴阳无始’”。朱熹在此充分吸收二程“动静无端，阴阳无始”思想，并以此阐释太极所含阴阳动静是时刻在流行变化过程中。虽然《太极图说》未言及“理”的概念，周敦颐思想中亦无直接探讨理与气的内容，但自朱熹通过对《太极图说》中太极与阴阳动静、理与气等范畴进行解说、发挥后，“太极”在理学视域中呈现出新的意义。

由太极阴阳动静伸展开来，朱熹将太极动静生阴阳之理贯穿到五行运行中：“盖五行之变，然无适而非阴阳之道。至其所以为阴阳者，则又无适而非太极之本然也。”“然五行之生，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，所谓‘各一其性’也。各一其性，则浑然太极之全体，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，而性之无所不在，又可见矣。”阴阳五行的运行变化，内在地具有太极之本然，此所谓各具其性。在朱熹看来，太极不仅指“理”，还指“性”。五行因气禀不同而各一其性，各一其性即是具有太极之理而为性，而五行因其气质有阴阳刚柔之殊而自为五行。

“夫天下无性外之物，而性无不在，此无极、二五所以混融而无间者也，所谓‘妙合’者也……自男女而观之，则男女各一其性，而男女一太极也。自万物而观之，则万物各一其性，而万物一太极也。盖合而言之，万物统体一太极也；分而言之，一物各具一太极也。”（《朱子全书·太极图说解》）

朱熹沿袭程颐的“理一分殊”的思路，指出太

极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，是“理之极至”，即“理一”，但就每个具体事物来看，都禀受了太极(理)作为自己的性理，这个关系就是统体一太极。而一物各具一太极，各个事物各有其特殊的表现形态，就是分殊。朱熹在一分一合之间说明天地万物的性质及其存在状态，一方面说明五行之性具有同一性，即太极。另一方面，天下的事物不能离开性而存在，但又不是各种孤立的存在，即太极与二气五行之分殊存在着相互贯通的关系，借用气的概念阐述了分殊的由来，对二程的“理一”与“分殊”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全面解释。

然而问题在于，在二程文集、遗书等著作中，二程不仅从未言及《太极图》及《太极图说》，而且还说“吾学虽有所受，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。”朱熹如何确认二程对周敦颐核心概念的继承？《太极图说解》说：“抑尝闻之程子昆弟之学于周子也，周子手是图以授之。程子之言性与天道，多出于此，然卒未尝明以此图示人，是则必有微意焉。学者亦不可以不知也。”朱熹认为二程不把《太极图(说)》手授门人，则定有微意，原因是“疑其未有能受之者尔”（《朱子全书·太极图说解后记》）。事实上，“对朱熹来讲，这个‘授受’是势所必争的，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史实上的考辨，或思想异同的分析，而完全是属于理论建构问题。”^{[3][120]} 换言之，朱熹以二程思想对《太极图说》进行改造，对周敦颐太极与二程理气学说之间构造一个观念，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思想上的诠释，更重要的是确立《太极图说》的学术地位，以此说明周敦颐与二程思想之间内在的、逻辑的传承谱系。

二、排道归儒

《太极图说》与佛、道的关系，历来多有疑义。诸如《太极图》渊源于南宋初年朱震在《进易说表》中所提出的传自陈抟、种放、穆修或道教？《太极图说》传自鹤林寺寿涯禅师？“无极”、“主静”、“无欲”具有佛、道特征？这些一直是学术界争议不休的问题。然而，《太极图说》过于简约，对“无极”、

“主静”等概念都未给予明确说明。朱熹推尊《太极图说》，反复强调《太极图(说)》“立象尽意，剖析幽微”，“果先生之所自作，而非有所受于人者”“夫以先生之学之妙，不出此图，以为得之于人，则绝非种、穆所及”(《周子通书后记》，《朱子全书·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七十五)，极力辟佛、道归儒。

“无极”是佛道两家，尤其是道家的重要范畴。陆九渊兄弟曾以无极出于《老子》，辩论“无极而太极”，书札往复，争论再三。为了与释老之学划清界限，不陷入陆九渊指责的“虚无好高之弊”，朱熹从“理”的高度进行了多角度的阐发：“‘无极而太极。非太极之外，复有无极也。’”(《朱子全书·太极图说解》)“老氏之言有无，以有无为二；周子之言有无，以有无为一，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。”(《答陆子静》，《朱子全书·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三十六)在朱熹看来，老庄以“有生于无”中的“无”为“无有”，与佛家的空虚寂没等同。而周敦颐的“无极”不同于老庄，“无极”是相对于“太极”的存在，在时间、空间上没有穷尽，即“无极乃无穷之义”。

针对陆九渊所提出的“无极”前人所未提及，朱熹又指出：“周子恐人于太极之外更寻太极，故以无极言之。既谓之无极，则不可以有底道理强搜寻也。”也就是说，“无极”为理解“太极即理”所指陈的天地万物之理的一个方便，具有无形无象的特性，即“无声无臭”。因此，“无极即是无形，太极即是有理。”相对于“无极”来说，无极是形上，太极是形下；相对于“阴阳”来说，太极是形上，阴阳是形下。“而”则是无极与太极亦一亦二，亦合亦分。朱熹以“无声无臭”解“无极”，以“理”解“太极”，突显了“太极”无束缚的性质，消除了从无极之外寻求其他本原的可能，跳出了以“有”、“无”解释世界的因果律的窠臼：就万物的本源来说，是无声无臭的“无极”，避免了“有有相生”的无限循环；从化生万物的角度看，“太极”是实有，避免了“无中生有”而失之空泛，从而凸现了太极作为宇宙之理的本质内涵。所以，钱穆先

生评价说：“理究不能说是无，理先于气，较之自无生有更妥惬，此为朱子发挥濂溪《太极图说》之圆通精明处。”^{[4]58}面对陆九渊指责的“叠床上之床”(无极之上有无太极)，“架屋下之屋”(无极之下有太极)，朱熹批驳这是陆九渊执意计较“无极”二字，“创为浮辨，累数百言，三四往返而不能已”，实为意气之争。在《答陆子静》中说：“若论‘无极’二字，乃是周子灼见道体，迥出常情，不顾旁人是非，不计自己得失，勇往直前，说出人不敢说底道理，令后之学者晓然见得太极之妙不属有无，不落方体。若于此看得破，方见得此老真得千圣以来不传之秘。”(《答陆子静》，《朱子全书·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三十六)“无极”的提出并非臆造，“乃是周子灼见道体”。

从表面上看，“无极”与“太极”之辨是朱熹与陆九渊之间的争论，实际上是儒道之争。陆九渊认为，如果承认“无极”的存在，也就等于承认了周敦颐蹈袭道家学说，儒学的正统地位就会受到怀疑。朱熹虽不否认“无极”的存在，但借用“有生于无”建立儒家“无极而太极”的理论，避老子而归乎中庸，不仅将道家因素儒化了，而且为儒家伦理道德寻求宇宙论和本体论提供了根据。正如陈荣捷先生所说“朱子之取资于太极，须经一番大奋斗……太极图渊源于道家。朱子之学虽与道家不契，但朱子亦必收敛其矜持而取资于太极图。此图亦含‘无’之观念，而此一观念绝非儒家所能接受。”^{[5]8}朱熹认为，佛道概念不可直接援引，只能间接阐释，也就是说，周敦颐能够将所有的思想资源在儒学的立场上加以整合，从而在宋明理学的建构中起着“关键性”的作用。因此，在校勘《太极图说》时，坚决反对“无极而生太极”、“自无极而为太极”等表述，实意味着朱熹理学思想的基本观点和诠释立场。

如果说，“无极”的提出是为了寻源探本的需要，那么，“主静”的追求则是为了更好地遵循中正仁义的道德准则。周敦颐认为宇宙的本体是“无极”，为此，人道修养的主要内容就在于“无欲”、

“主静”。因为周敦颐宇宙本体论的最高范畴是无极，无极的形态是静虚的，人生论的最高法则也应该是静虚的，所以周敦颐自注“无欲故静”。然则，儒家讲“静”较少，而释、道讲“静”颇多，朱熹以《周易·系辞下》中的“寂然不动”来解读“主静”，将佛老的“静”融入儒家“敬”的内涵中：

“此言圣人全动静之德，而常本之于静也。盖人禀阴阳五行之秀气以生，而圣人之生，又得其秀之秀者。是以其行之也中，其处之也正，其发之也仁，其裁之也义……苟非此心寂然无欲而静，则亦何以酬酢事物之变，而一天下之动哉！”（《朱子全书·太极图说解》）

若心性寂静无欲，那么就可以达到圣贤的中正仁义的境界，从中可见，主静就是复归于“圣人之道”，这与“太极之有动静”相应。“程子是怕人理会不得他静字意，便似坐禅入定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94）朱熹以“主敬”诠释“主静”，进一步突出了二程哲学的内涵，使《太极图说》中的“主静”同佛家的禅定、道家的虚静划清了界限。

三、诠释性理

《太极图说解》于乾道九年(1173)定稿后，朱熹从未将其公开于众，直到淳熙十五年(1188)“近见儒者多议两书(《太极图说解》、《西铭解》)之失，或乃未尝通其文义，而妄肆诋诃。予且悼焉。因出此解以示学徒，使广其传，庶几读者由辞以得意，而知其未可以轻议也。”经过了陆九渊兄弟的来书质难，鉴于当时世人未通《太极图说》的文义却妄肆诋诃，才将《太极图说解》公诸于世。朱熹认为《太极图说解》是高度成熟的理论形态，希望人们通过解义了解他的看法，并以此告诫读者“未可以轻议也”。

然而，周敦颐的思想怎样影响着朱熹？为何朱熹要不遗余力地为《太极图说》辩论，并强调“未可以轻议”？朱熹在注解《太极图说》时指出：

“盖人物之生，莫不有太极之道焉。”

“盖人禀阴阳五行之秀气以生，而圣人之生，

又得其秀之秀者。是以其行之也中，其处之也正，其发之也仁，其裁之也义。盖一动一静，莫不有以全夫太极之道，而无所亏焉。则向之所谓欲动情胜、利害相攻者，于此乎定矣。”（《朱子全书·太极图说解》）

朱熹在《太极图说解》中二次提到“太极之道”。何谓“太极之道”？按照朱熹的理解，“太极之道”有二层涵义：其一，阴阳动静的所以然之理。其二，圣人之道。阴阳动静之理推之于人的本性领域，即在于“众人是动静之理而常失之于动也”，惟有“圣人全其动静之德而常本之于静”，所以圣人始终具备此道，故为“最灵”。由此不难理解，朱熹之所以极力推崇周敦颐，其主要是因为《太极图说》解决了儒家学说中“天道”伦理化，让伦理道德建立在从“自然而然”到“理所当然”的价值维度上，从而勾勒出天道性命贯通为一的学说，这正是承续孔孟道统、复兴儒学千载不传的心性义理精微的关键。同时，也凸显出朱熹注解《太极图说》以性理学为圭臬的特点。

自从朱熹为《太极图说》作注释以后，历代学者围绕朱熹的注释引发的争议不断。朱熹在《太极图说解》后作《附辩》说：“愚既为此说，读者病其分裂已甚，辩诘纷然，苦于酬应之不给也，故总而论之。大抵难者或谓不当以继善成性分阴阳，或谓不当以太极阴阳分道器，或谓不当以仁义中正分体用，或谓不当言一物各具一太极。又有谓体用一源，不可言体立而后用行者；又有谓仁为统体，不可偏指为阳动者；又有谓仁义中正之分，不当反其类者。是数者之说，亦皆有理。然惜其于圣贤之意，皆得其一而遗其二也。夫道体之全，浑然一致，而精粗本末、内外宾主之分，粲然于其中，有不可以毫厘差者。此圣贤之言，所以或离或合，或异或同，而乃所以为道体之全也。”（《朱子全书·太极图说解附辩》）从《附辩》可以看出，当时学者对《太极图说》的辩论主要集中在七个方面：继善成性分阴阳、太极阴阳分道器、仁义中正分体用、一物各具一太极、体用一源、体立而后用、仁为统体。朱熹

注重义理的发挥,希望通过讲学、论辩来砥砺自己的学问,纠正别人的思想。尽管这些问题一直没有达成共识,同期张栻作有《太极图说解》、吕祖谦作有《太极图义质疑》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理解,但是质疑归质疑,籍其讲学、论辩,朱熹《太极图说》的注解变得更加严密,最终成为了宋明理学的理论构架。

除了对《太极图说》进行理学化的阐释,朱熹还依托文本对理学中重要范畴,如“道”与“器”、“体”与“用”进行阐述。例如第二类即是“程子曰:‘形而上为道,形而下为器,须着如此说。然器亦道也,道亦器也。’得此意而推之,则庶乎其不偏矣。”(《朱子全书·太极图说解附辩》)朱熹运用二程思想,解太极与阴阳的关系为道与器的关系:太极无形,为形而上之道;阴阳即气,为形而下之器,以此说明“太极不离于阴阳而亦不杂于阴阳”的观念。又如,第五类“又有谓体用一源,不可言体立而后用行。”这是朱熹将程颐的“体用一源,显微无间”与周敦颐《太极图说》结合起来,并应用到太极与阴阳的关系上。“体用一源”是程颐在《易传序》中提出的命题,也是宋明理学的重要理论依据,体用与显微是指理与象的关系:“至微者理也,至著者象也。”(《周易程子传序》,《二程全书·伊川易传序》)即是程颐所谓的理与象的关系。从理上说,理虽然是形而上者,但其中具有万象,即是“体用一源”;从象上说,至著之象是形而下者,但理寓于其中,即“显微无间”。朱熹在此所表达的是太极之理与万物的关系,已超出《太极图说解》的诠释范围,朱熹运用意义扩展的方法,得出了“理一分殊”的结论。在《答杨子直》中说:“熹向以太极为体、动静为用,其言固有病,后已改之曰:‘太极者,本然之妙也;动静者,所乘之机也。’此则庶几近之。”(《答杨子直》,《朱子全书·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四十五)朱熹之所以作修改,是因为太极不能脱离阴阳动静而存在,更重要的是,朱熹难以应付来自各方的质疑。

总体而言,由周敦颐《太极图说》到朱熹解义,

意味着宋代新儒学建立的开端与成熟理论的实现。

《太极图说》本身的撰写都是在讲学论辩中进行,其后,遂成为历代学者讨论的焦点:“在争论期中,《太极图说》仍为新儒家哲学之基石。朱子之塑造新儒家哲学,仍以此《图说》为主要基础。朱子之所为,非仅只综合诸儒之不同概念,此非仅为一结构上之重组或综合,有如吾人所尝称者,朱子学说实为一有机之重建,此是朱子新儒学独造之论。”^[518]这一“独造之论”,确立了《太极图说》在道学中的重要地位。朱熹与吕祖谦编辑《近思录》列《太极图说》于卷首,指出该卷“性之本原,道之体统,盖学问之纲领也”,可见影响之大。“自朱子以来,《太极图说》已为新儒家形而上学讨论之起点”,^[518]亦是韩国性理学研究的焦点。韩国朝鲜时期性理学家退溪李滉(1501-1570年)作《圣学十图》,并向宣祖进献。其中,第一图即是周敦颐的《太极图》,并指出:“朱子谓此是道理大头脑处。又以为百世道术渊源。今兹首揭此图,亦犹《近思录》以此说为首之意。盖学圣人者,求端自此,而用力于小大学之类,及其收功之日,而溯极一源,则所谓穷理尽性而至于命,所谓穷神知化,德之盛者也。”(《退溪全书·进圣学十图札》卷七)在韩国性理学兴起的过程中,《太极图说》受到了士林的普遍重视,被很多学者解释为具备了天地万物之理和人伦道德之本,逐步形成了以《太极图说》为根据的韩国性理学研究、辩论思潮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杨柱才.道学宗主——周敦颐哲学研究[M].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04.
- [2] 钱穆.朱子新学案(中)[M].成都:巴蜀书社,1987.
- [3] 何俊.南宋儒学建构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4:120.
- [4] 钱穆.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[M].北京:三联书店,2009.
- [5] 陈荣捷.朱学论集[M].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7.

责任编辑:曾凡盛